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Migrants in China

中国流动人口经济融入

杨菊华 / 著



21 世纪人口学研究系列



21 世纪人口学研究系列

中国流动人口经济融入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Migrants in China

杨菊华 / 著

C924.24

49

编目(CIP)数据

中国流动人口经济融入/杨菊华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1

(21 世纪人口学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3899 - 3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流动人口 - 研究 - 中国
IV. ①C9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3908 号



· 21 世纪人口学研究系列 ·

中国流动人口经济融入

著 者 / 杨菊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郑 燕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韩莹莹

责任校对 / 张立生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899 - 3

定 价 / 98.00 元

印
字

张 430.5
数 / 531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丛书总序

1662年,英国人约翰·格兰特出版专著《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标志着现代人口学的诞生。迄今为止,世界人口学的发展历史已有300多年。

1974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创建,是国内创办最早、学术力量最为雄厚、人才培养层次最全的人口与发展领域的专门教学和科研单位。从此以后,国内第一个人口学专业硕士点、国内第一个人口学专业博士点、国内唯一的人口学重点学科点、国内唯一的人口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相继在此诞生。

2011年10月31日,联合国人口基金宣布全世界人口达到70亿。这一天,距1999年的“60亿人口日”不过12年。

2010年11月1日,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揭示中国总人口超过13.7亿。相比较1953年7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6亿,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人口数量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

人类生活在愈来愈拥挤的地球上,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由不断出生、死亡和迁移流动着的人群所决定,这也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

以人类人口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口学尽管发展了300多年,依然疑惑着人类的发展空间、好奇着人口的变化因果、争论着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探索着人口未来的走向。也许,正如对人类的终极考问“你是谁?”“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一样,生命不息,对于人、人群及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探索就会没有止境。

在人口形势和人口问题上,全世界各个国家既有共同语言,又各怀难言之隐。“婴儿潮”的一代人刚刚淡出视野,“低生育率”的焦虑又跃上心头;正无奈于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劳动力短缺的号角却已吹响;更不用说“银发浪潮”

铺天盖地，国际移民四处奔走。“生存还是死亡？”在人类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似乎早已不是问题，但如何提升生命素质、提高生活质量却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追求。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人口转变遵循了世界的一般规律，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模式已转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模式。然而，庞大的人口基数、迅速的转变过程、独特的中国国情也带来了非同一般的人口现实和无先例可循的人口问题。

21 世纪，一个新的起点。对于人口的过去和未来，我们充满好奇和探索精神。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教授所指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中，地域差距极大，人口状况千差万别，人口问题更是复杂多样。实践呼唤理论，实践呼唤人口科学的发展。正是这种复杂的人口国情，为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因此，中国的人口学没有理由不出经典巨著，没有理由不出大师级人物，没有理由不站在国际人口学学术前沿。”

受此鼓舞和启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学系人口学教研室酝酿策划了这套丛书，希望用我们的眼光和视角关注 21 世纪的人口学，用我们的智慧为人口学研究添砖加瓦。在此要特别感谢教研室的各位同仁：人口学系系主任段成荣教授、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爽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学博士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博士陈卫教授、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博士杨菊华教授和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巫锡炜讲师。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985 工程”经费的资助，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精心编辑，使这套丛书得以面世。

我们希望，以这套研究丛书为契机，中国的学者站在 21 世纪，纵观人口的过去，展望人类的未来；立足于中国，通过中国的人口现实折射世界的人口形势，以中国的人口经验充实世界人口学的宝库。

人口学教研室主任 宋 健

2012 年 4 月于北京

前言

人口流动就是人们因为学习、工作、婚姻或其他原因在空间上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现象。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受制度制约、交通不畅、机会欠缺以及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和“父母在,不远游”祖训的影响,除少数情况外,以个体为单位的人口流动并不多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加快,制度性的限制逐渐被跨越,地域之间的距离“被”缩小,新的生存机会越来越多,人们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判断发生了相应改变,人口流动现象越来越普遍。虽然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双重壁垒依旧存在,但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构成人口流动的驱动力之一。城市和发达地区的都市文明和现代工业、更多的劳动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好的生活条件、更优越的受教育机会、更多样化的社会环境,等等,令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不同年龄及不同层次之人怦然心动。对改善生活环境的渴望及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形成强大推力,驱动人们冲破制度性羁绊,突破结构性藩篱,克服经济成本和心理压力,肩背行囊、怀揣梦想,从农村来到城市,从中西部来到沿海,从小城镇来到大都市,从欠发达地区来到发达地区,形成了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人口流动大潮。从绝对数量看,2010年,流动人口总量超过2.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5%;从增长幅度看,在1982~2010年这28年间,中国人口总量大约增长了0.3倍,而流动人口总量却增长了30多倍。

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突出的变化之一,也是引发社会变革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十二五”时期,流动人口规模将保持在2亿人以

上,在城镇常住人口中的比例将达到30.0%左右(张春生,2010)。而且,中国正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和城镇化的加速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继续对流动劳动力产生较大需求。按人口城镇化率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测算,到2020年还将从农村转移出1亿左右的人口,流动人口总量将继续增加、规模将持续扩大。作为一个特殊人口群体,他们将长期存在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进程之中。

流动的行为载体是个体,其决定的主体涉及家庭,受制于个体的劳动技能和预期、家庭基本特征、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宏观经济结构、国家及地方层面的公共政策,等等;反过来,该决定和行为也反作用于社区和社会。社会人口现象是通过微观环节来实现其宏观效果的,人口流动对社会的影响必须通过对个体和家庭的影响来实现;同样,经济社会因素也会影响人们的流动决策、流动模式,以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流动行为的宏观后果,还必须加强流动对个体(和家庭)影响的研究,尤其需要关注他们在流入地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本书尝试探讨流动人口个体在流入地获得的绝对经济地位和相对经济融入水平、特点及影响要素。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经济融入”并不意味着与流入地市民的经济状况绝对一致,而应是流动人口良性地参与流入地的经济生活,获得与其劳动相契合的劳动保护、经济地位、社会保障和生活水平等。否则则过于极端,不仅与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实际上也很难实现。

一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流动人口进入流入地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是适应、融入问题。社会融入是个体之间、群体之间、文化之间互相接触、相互竞争、相互冲突、互相适应的过程(Park, 1928)。在进入流入地伊始,初来乍到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在一个陌生环境中,原有的社会资本大多失去,经济资本相对贫乏,人力资本比较低下,且其语言文化、价值观念、生活习惯、言行举止等方面均与流入地社会存在明显差异。再加上流入地社会的制度障碍或主观歧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经历一个隔离(segregation)的过程,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逐步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经验表明,由于流动人口本身的特点和流入地方方面面

的制约，只有少数第一代流动人口能够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绝大部分人将沦为弱势群体，被边缘化，产生无所归依的心理，感到困扰、不安、矛盾、愤怒、忧伤或退缩、思乡。边缘化现象也就是隔离现象，它既阻碍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又暗示着他们融入机会的缺乏。

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如何融入城市社会生活，国家、流入地政府和公民社会如何帮助有融入意愿的外来人顺利地融入流入地社会，不仅是社会学家一直关注的经典学术命题，而且是相关政府部门极为重视的现实问题。国内外的研究表明，融入的内涵是复杂的，涵盖多个维度，覆盖客观和主观指标；融入的概念是相对的，有融入就会有排斥，而没有排斥也不意味着就能融入；融入的过程是漫长的，往往需要两三代人才能实现；融入的途径是复杂的、多向的、互动的，既要自己愿意融入，也要他人接纳自己，事关流动的主体和流入地的主体，也涉及融入的客体，是利益攸关方互动的结果；融入的影响是多要素的，是制度性、结构性等宏观要素，个体自身发展能力、流入地居民的包容接纳等微观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融入意愿、过程和结果折射出他们的生存环境，昭示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人群能否享受公正待遇，体现了国家和地区以人为本的管理服务理念是否落实到位。因此，社会融合不仅是单纯的个人问题或人口问题，更是复杂的群体现象和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不仅牵涉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反映出社会资源配置的规则和秩序；不仅关涉流动者自身的发展能力，更透视出流入地的经济结构及方方面面的公共政策、宏观制度；不仅关系到流动人口本身的融入意愿和努力行为，更事关流入地居民的态度和行为。因此，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中国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特定历史时期面临的一个事关全局、事关未来的重大现实问题。他们能否实现由外来人口向本地市民的转变，实现身份认同，并真正融入当地社会，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顺利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前提条件，也是落实以人为本、民生为先的管理服务理念，实现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的重要基石；反过来，流动人口的融入状况也是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和谐的关键标识。因此，加强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其一，从学术上看，这项研究将在中国流动人口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学

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流动人口的权益、诉求、保护、融入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众多学者分别从城市学、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不同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探讨,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然而,已有的研究要么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宽泛的理论解读,要么是在微观层面上对某个城市农民工权益问题进行研究,而从多个层面明确关注整体流动人口融入状况的研究成果不多。从个体等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层面了解并把握流动人口的融入模式、趋势、特点和影响因素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一方面可以与已有的研究理论进行对话,并予以补充和修正;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具有代表性数据的分析,检验维度理论和影响因素理论,并为他人的研究提供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依据。同时,本书的研究发现也将有助于深化学界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存发展状况的认识。

其二,从现实上看,关注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是对政府关注民生问题的一个切实回应。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流动人口问题。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问题,2006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做出完善和发展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重大决策;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2011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制定引导人口合理流动、有序迁移的政策,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统筹协调好人口分布和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的关系,把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纳入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为人口流动迁移创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因此,既从多个指标,也利用综合性指数,全面、系统地探讨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将有助于政府总体把握和全面了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存发展状况,有助于推进流动人口的有序流动与合理分布,有助于人口问题的统筹解决,有助于推动积极健康的城镇化进程。

其三,从政策上看,重视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状况将有效推进社会管理、社会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人的发展目标相统一,从一味地追逐单向的经济发展指标到开始关注人文社会指标;不同人群之间的融洽相处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应有之义。了解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模式、特点及影响因素,将有助于政府对流入地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做到心中有数,为政府决策部门在制定促进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会的公共政策时提供坚实的科学理论和实证依据,以促进流动人口的融入步伐,简化其融入过程,扩大其融入途径,改善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工作,进而为流动人口创建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打造外来人口与本地市民平等相处的和谐画面。同时,了解流动人口的融入现况及其影响因素还将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化过程中的建设规划、服务规划等相关问题提供参考借鉴依据。

其四,从社会上看,了解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状况有助于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帮助流动人口实现融入。考察流动人口经济融入方方面面的影响要素,将加深公民社会及流动人口本身对这个群体状况的认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帮助他们改善在流入地的生活,倡导并鼓励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更自觉地、更有意识地交往与交融,倡导本地市民以更加包容、接纳的态度对待流动人口。假若流动人口未能被流入地所接纳,反而被边缘化、否定化、异化,这将是多方面的损失:流出地丧失了一份人力资源,流入地浪费了流动人口的才能,流动者本人未能一展所长,其福利的改善只是空谈。

总之,从战略性视角,高度重视、正确认识、科学系统地探讨流动人口的融入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和谐发展大局的历史性课题,在实践和理论意义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把握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过程、面临的障碍、存在的问题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重新审视以往社会发展指标的必然要求。反过来,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可视为地方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和新时期社会建设水平的重要测评指标和进一步推进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社会建设的依据。

二 现存研究的局限

的确,人口流动现象及流动人口的特征要素早已引起学界、社会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是,与流动人口持续增长的规模相比,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这样一些具有深远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的重大问题,直到近年才真正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总体而言,中国关于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折射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对这一人口现象、这个人口群

体的认识历程。

1980~1995年,学术和政策研究主要探讨流动人口的总量、结构、个体特征,他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他们的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人口、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等宏观问题。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对流动人口问题研究的日趋深入,特别是近年来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管理服务理念的提出和落实,相关研究开始关注流动对流动者本人在流入地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及其家庭的影响,该人群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现状、过程及特点也提上了研究日程,成为当前包括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公共政策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虽然直到最近几年,较少有研究直接使用“融合”“融入”等概念,但很多学者从多个视角探讨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适应情况。研究发现,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结构、户籍等制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流动人口往往处于流而不迁、流而不留的状态,难以成为流入地的永久居民,形成与流入地户籍人口相对应的两类人群:(1)常驻的“外来人”;(2)候鸟式的“迁徙人”,这是流动人口未能融入流入地社会的反映。

然而,虽然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已引起了广泛重视,但由于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抽象概念,再加上学界开始关注的时间较晚,故现存学术和政策研究都还处于比较原始的起步阶段,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研究深度、广度、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和时效性等都有待进一步厘清、深化与拓展。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理论与数据相脱节。在现存研究中,虽然有些尝试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数据分析,也有些尝试利用数据的分析结果来验证理论,但为数不多;相反,多数研究的理论和数据往往是脱节的:要么是纯粹的理论性论述,要么是纯粹的数据描述,要么是虽有理论和数据,但二者未能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对流动人口的关注一直停留在现在有多少人,未来还会有多少人;他们主要来自哪里,又去了哪里;他们都是哪样的人,在干什么,带来了怎样的宏观影响,等等。理论不清和概念不明一方面影响了我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现状、特点、后果及原因的认识,使我们在相关的社会调查实践中缺乏统一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如果说在早期研究中,必须重点摸清流动人口的总量及变动趋势、特征要素、宏观后果等问题,那么,在对这些问题有了相对准确的把握后,加强对包括融入在内、强调理论与数据有机结合的科学研究势

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流动人口的民生需求。

其二，相对视角的缺失。经济融入是与本地市民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故只有与本地市民进行比较，才能准确把握其融入水平与特点。但是，除了极少数文献外，目前的绝大多数研究只是考察流动人口的绝对状况。这样不仅存在方法问题，而且将忽视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的差异：流动人口的绝对经济状况可能不尽如人意，但若本地市民的相应情况同样不佳，则其相对融入水平可能较高；反之，流动人口在拥有较好的绝对经济状况的同时，未必拥有相匹配的相对水准。前一种情形可能夸大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差异，低估其融入水平；后一种情况则可能缩小他们之间的差异，夸大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因此，虽然把握流动人口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可考量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现况，但融入研究还必须比较流动人口相对于本地市民的经济社会状况。

其三，分层比较的不足。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群体，存在多种形式的社会分层，尤其是由户籍类型引发的分层。在过去30年间，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始终是流动人口的主角，也是流入地社会最为弱势的一个群体，对他们无论怎么关注都不过分。但是，城镇户籍人口的流动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过程：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一些城镇户籍人口、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纷纷辞职，到沿海地区或在内地经商办厂。虽然他们的总量大大低于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但影响也是巨大的。同时，随着地区之间不平衡性发展的加剧，他们的数量也呈上升态势，2010年约占到全部流动人口的1/5，规模无疑也是巨大的。但是，由于我们一直关注农民工，对该群体或视而不见或将二者等同视之，比较不同户籍身份流动人口之间差别的研究是少之又少，仅有张展新（2007）、张展新等（2007）等少数研究同时关注不同户籍身份流动人口。显然，不同户籍身份流动人口的先赋因素和自致要素存在天壤之别，故在流入地的生存状况、发展能力、融入水平等也会存在显著差异，既不能将他们混为一谈，也不能对城镇户籍流动人口视而不见、置之不理。

其四，研究内容的系统性和深入性不够。过往研究多针对单个融入指标，利用综合指数总体把握流动人口经济融入情况的研究明显缺失，而既利用综合性指数全面把握，又借助单个指标具体分析该人群在不同指标的融入水平的研究更是少见。即便是对单一指标的分析，也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往往关注经济融入的某一个指标，很少有研究同时考虑多个指标，比较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在不

同指标上的差异；二是对某些单一指标关注得多，而对另一些指标关注得少，比如，现存研究十分关注流动人口的职业、收入，但对劳动保护指标的研究明显较少。同时，不少研究缺乏深度，多停留在对数据的现状、特点的描述上，探讨因素之间的独立关系、深入挖掘影响机制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正因如此，现存研究多较零散，缺乏必要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中国地域辽阔，东西之间、南北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发展差距甚大，流动人口的公共政策与管理服务措施及水平等方面也不同，户籍制度壁垒、二元经济结构无疑会促进或阻碍他们的融入过程、速度与结果。同样，不同地区存在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且有些地方的居民热情大方，对外来人口比较和善友好，而有些地方的人个性独立，对外来人口态度漠然甚至排斥，这也会影响到流动人口的融入过程和结果。此外，不同流动个体的人力资本、自身发展能力有别，从而也会作用于他们的融入程度与特点。然而，上述局限使许多重要的问题尚未得到厘清：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意愿、过程和结果如何？他们能否较快地融入流入地社会？哪些层面的融入程度更深，哪些层面更难融入？哪些人群能较快地融入流入地社会，哪些人群难以达成融入的期望？哪些因素推动他们的城市融入，哪些因素阻碍他们的城市融入？个人自身的发展能力，流入地的公共政策、经济结构，流入地居民的态度和行为等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起到多大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探讨。

同时，上述不足也阻碍了我们对流动人口融入不足潜在后果的深入了解和全面把握，使某些政府官员、学者、民众对该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清，使政府决策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缺乏必要的科学理论和实证依据，从而不能及时采取必要和可行的措施促进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过程、步伐，不利于甚至可能阻碍流动人口福利的改善。大量的流动人口对社会的各组织、各单元，对政府部门的和管理和服务工作都提出了全新的巨大挑战，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可资参照，国内也没有公认的理论予以说明和阐释，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前行。该局面也对学界提出挑战，呼唤学者全方位地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证探讨，这不仅是中国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的迫切需要，还将对整个人类做出贡献。该现象还对（流入地）社会提出挑战，呼唤社会各人群以更为包容、接纳的态度和行为对待流动人口，帮助他们更快更好地适应流入地的生产和生活。

三 概念界定

在叙述本书的研究目的之前，首先界定本书涉及的关键概念。

（一）外来人、外来人口与流动人口

本书互用这三个概念，不做区分。

（二）农民工与乡—城流动人口

这是两个既有差别，又相互交叉的概念。农民工是指在本地区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籍工人，本书仅指后者，即狭义的农民工。他们是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乡—城流动人口以农民工为主体，但涵盖的范围比农民工更宽，还包括具有农村户籍，但离开了户籍地的非就业劳动年龄人口、少年儿童和老年人。

本书中，乡—城流动人口指具有农村户籍，但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或以上，流入其他县（市、区）城镇地区的流动人口。由于本书关注的对象为在业人口，故乡—城流动人口这一概念所指人群与农民工相同。在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时，沿用原作者的用语，但本书使用“乡—城流动人口”。

（三）外来市民与城—城流动人口

本书中，城—城流动人口与外来市民互用，都是指具有城镇户籍，但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或以上，流入其他县（市、区）城镇地区的流动人口。

（四）本地人与本地市民

本书互用这两个概念，泛指拥有流入地城镇户籍的居民，但不包括拥有流入地农村户籍的居民。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构成流动人口的参照对象，也是流入地社会的主流人群。

（五）流入地、流入地社会与目的地

本书互用这三个概念，泛指流动人口所流入的地区，或指省（直辖市、自治区），或指地（市）。

（六）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经济社会地位）、经济融入与经济整合

本书互用经济地位（economic status）、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经济融入（economic assimilation）、经济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不过，融入仅适用于流动人口，而（社会）经济地位适用于所有人。

（七）融入与融合

概念“融合”“融入”存在差别。杨菊华（2009）认为，“融入”是“融合”的第一步，而“融合”是“融入”的更深层次。本书使用“融入”概念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经济适应现况，但在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时，沿用原作者的用语。后面“经济融入的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一章还会详细辨析这两个概念的异同。

（八）经济融入与社会融入

笔者在以前的文献中谈道，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是多维度的，始于经济整合，经过文化习得、行为适应，最后达到身份认同，而且各维度之间互动密切（杨菊华，2009）。对绝大多数流动人口而言，经济融入或整合最为关键，构成其他维度融入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经济融入，流动人口难以在流入地生存下去，也难以实现在其他维度上的融入；尽管有其他方面的融入，也未必一定会有经济融入。反过来，其他维度的融入也会反作用于经济融入。本书不对这两个概念做严格区分，但在使用经济融入时，具体仅指研究对象的绝对和相对经济社会地位；而在使用社会融入时，泛指整体融入情况。

四 本书的研究目的

本书关注16~55岁在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经济融入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之所以关注这个年龄段的人群，主要是出于可比性的目的，因为年龄更大之人外出务工的比例较小，而年龄更大的本地市民或已退休。之所以关注在业人口，主要是考虑到流动人口的选择性：流动人口是一个具有高度选择性的群体，

他们之所以能留在流入地，多是因为处于就业状态，而未能就业之人或流入他地或返回家乡；因此，若考虑就业状况，则流动人口的就业水平无疑存在虚高的可能。之所以关注经济融入，一是如前文所述，经济融入是社会融入的基础，是流动人口立足流入地的前提和保障，故若要全面把握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现况，首先必须准确了解流动者的经济融入情况；二是由于数据的局限，因为本书使用的数据并不提供社会融入其他方面的指标。

本书将在先期理论与指标体系的指导下，利用具有代表性的数据，采用实证研究视角，以流入地居民为参照对象，描述流动人口以及不同户籍身份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经济融入现况，探索其融入特点，挖掘其融入的影响要素。我们希望，本书比较系统的研究结果能加深学界和政府部门对流动人口经济融入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并为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善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状况，有效推进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公共服务政策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本书旨在回答以下问题：

1. 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之间在经济社会地位获得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比较本地人与外来人，探讨群间差异，考量在其他因素相同的前提下，由户籍地点造成的内外之别是否影响到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结果。粗略地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回应了流入地的结构性要素对经济融入的作用。

2. 不同户籍身份流动人口之间在经济社会地位获得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比较城一城流动人口与乡一城流动人口，探讨流动人口群体内的差异性，考量在其他因素相同的前提下，由户籍类型造成的城乡差别是否影响到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结果。简而言之，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回应了户籍等制度性要素对经济融入的作用。

3. 个体自身特征和发展能力等要素如何影响不同身份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通过控制户籍制度、流入地区、流动特征等要素，可考量其他因素（如：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就业特征）对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作用。粗略地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回应了流动人口个人发展能力等要素对经济融入的作用。

4. 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是否因流入地区的不同而异？本书通过将全国区分为八大区域，考量流入地区对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影响。

5. 流动特征（如：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域、离开户籍地时长）是否影响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通过控制上述诸多要素，考量流动特征与经济融入之间的独立关系。

6. 采取哪些公共政策、措施可以缩小本地市民和外来人口的群间差异，以及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之间的群内差别，进一步改善流动人口的经济福利？要回答这个问题，则要在上述问题得到回答后，从整体上把握不同人群之间的现状和差距，从而从政策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本书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来回答上面几个研究问题。

（一）构建理论框架、指导分析研究

由于中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伴生物，是近30年来愈演愈烈的人口现象，故直到当下，有关流动人口融入理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这需要呼唤更多的相关人士参与到研究中，形成一个既具有全球意义，也适合中国国情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理论框架，从而为构建流动人口经济融入指标体系、创建社会融入指数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为全面、系统、综合、深入地把握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理论涵盖两大层面：一是融入的内涵；二是融入的影响因素。这是因为，社会融入是一个抽象、宽泛的概念，首先必须对其有一个明确的理论认识。前者是指我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本身的认识，即社会融入是什么？包括哪些维度？后者是指影响社会融入的个体、家庭、社会、政策、结构因素。二者所要回答的问题分别是：“社会融入是什么”，“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影响融入指标的选取和数据分析中变量的选择，这将是贯穿本书的理论线索。

（二）摸清融入现状、描述融入特点

分析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首先必须摸清该人群经济融入现况、模式与特点。为从深度和广度上同时推进现有研究，本书从多角度入手，关注四个重要且敏感的衡量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指标及所覆盖的若干变量。

1. 劳动保护（包括劳动合同签订、劳动时间）。劳动保护既是融入的重要指标，也会影响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居住条件。